

2013 年马上就过去了，经济、社会的前景依然没有明朗，回望过去，“高和·2049 论坛”一直秉承审慎原则与专业精神，以期在帮助大家减少因为冲动而发生错误的同时，不会错失巨大良机。展望未来，我们仍然心存敬畏。我们相信，只有敬畏之心，才是防守和进攻都必须秉持的根本。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 导读

### 特稿 >

#### 基尼系数为什么迅速提高？

文 / Davide Furcer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

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本文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原因，并建议各国政府应在这些政策与其带来的分配效应之间作出权衡

### 智库 >

#### 比特币的优势与劣势

文 / Ian Gordon 美银美林分析师

按照目前的供应量折算后，1 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可达 1300 美元。但我们还得仔细分辨这个新事物的优势和劣势

#### 中国消费增长仍然最快

文 / Steven Barnett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主管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弱。但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文 / 何茂春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化时代，我国为何再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既为创新，“新”在何处？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载起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推动东西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

#### 什么是数据主权？

文 / 胡凌 巨杉集团创始人

如果说“互联网主权”、“信息主权”仍然带有传统国家安全的政治意味，“数据主权”则伴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挖掘而进入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视野

出品：

高和  
GO HIGH 中国商业地产基金的领跑者

信睿  
Thinker

制作：

《信睿周报》

征订信箱：

zhangchen@gohighfund.com



## 特稿 >

### 基尼系数为什么迅速提高？

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2012 年，美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一半。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出现过。在很多发达国家，近期这一恶化速度已经升至 20 多年来的最高点。本文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两个原因，并建议各国政府应在这些政策与其带来的分配效应之间作出权衡

文 / Davide Furceri , Prakash Loungani 编译 / 刘浩

收入不平等状况现已达到历史高点。2012 年，美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一半。这种掠夺性的分配状况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美国从未出现过。截至 2010 年，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过去 3 年内比过去 12 年内更为严重。近期，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一恶化速度已经升至 20 多年来的最高点。

如何解释这种恶化局面呢？大量工厂正在运转。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为那些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和拥有信息技术的人带来了福利。全球供应链已将低技术产业移出发达国家。这就造成发达国家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直线上升，进而抬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那些只具备低技术的工人来说）。

近期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对外资进入与竞争的开放，也即资本账户自由化。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些政策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财政整顿，或者财政“紧缩”。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财政整顿。毕竟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评估确定它们对经济有益才实施的。本研究要表明的观点是应在这些益处和它给收入分配带来的冲击之间做出权衡。有些时候政府或许可以制定政策减轻这种冲击。IMF 总经理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建议“财政政策不仅要注重效率，还要注重公平，特别是在共同分担调整责任上的公平，以及在保护弱者时体现出的公平。”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财政整顿

#### 开放造成不平等

过去三十年内，各国对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大大降低，这在 IMF 的《外汇安排与外汇限制年报》一文中有所提及。这些报告中构建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显著增长，即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逐步被取消。同时，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加重，这一点可由基尼系数体现。当一国的所有收入被平均分配时，这一系数数值为零，当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时该值为 100（或 1）。

为了揭示两者的发展是否相关，我们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大幅变动的情况，这代表政府为推进本国金融业开放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一标准，在 17 个发达国家中有 58 次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变革。这些变革对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平均来看，在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紧接发生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剧烈且持续性的增加。自由化之后，基尼系数每年约增加 1%，五年后增加约 2%。

该结果的稳健性也被记录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地，即使存在大量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比如产出、贸易开放、政府规模的改变、产业结构变革、人口结构变革、以及对产品、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监管），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冲击也是成立的。

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多渠道能够对收入不平等加重产生影响。例如，这种自由化允许财务有限公司从境外借入资本。如果这些资本用于补贴技术工人，那么对这些工人来说，资本自由化就增加了他们的相对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事实上，研究已证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工业中更为显著，因为工业更依赖于外部融资，并且用于补贴技术工人的资本比例更高。**

### 谁受伤了？

财政整顿——削减支出并增加税收以降低财政赤字——是一种常见的政府行为。因此有很多历史经验能指导我们去研究这些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过去 30 年内，我们的 17 个发达国家样本中有 173 次整顿发生。平均来看，这一政策使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降低了 1%。

很显然赤字削减之后紧接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财政整顿两年后，基尼系数增加 0.2%，8 年后基尼系数增加将近 1%。

对上述结论的一种解释是：尽管财政整顿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相一致，但实际上存在第三个因素能导致这两者共同变动。例如，经济衰退会造成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同时也会导致债务占 GDP 比重增加，这就意味着财政整顿的几率增加了。然而，即使控制了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财政整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依然存在。其他对于这些结论的稳健性检验将在 IMF 的两篇论文中有所涉及。

**财政整顿会通过很多渠道加重收入不平等。**例如，通常与财政整顿相关的社会福利、公共部门工资以及就业率的降低或许会对低收入群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财政整顿对长期失业的影响是另一种可能的渠道，因为长期失业将会与收入大规模降低有关。

### 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自由化与财政整顿都将带来福利。前者允许国内公司涉足国外资本池，并常常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获得国外技术。它还允许国内储户投资于国外资产。如果能够合理管理，这种扩张的机会将极具收益性。同样，财政整顿一般以降低政府债务至安全水平为目的。低债务反过来也会降低利率进而有助于经济发展，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在拥有较低利息支付负担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削减税收。

然而，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对很多国家政府来说成为一大难题时，如何在这些好处与分配效应之间进行权衡也非常重要。意识到这些分配效应或许会使一些政府制定政策来处理这些分配效应。例如，更多地采取累进税并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将有助于减缓财政整顿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来减缓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本文原题为“Who Let the Gini Out?”，作者 Davide Furceri 和 Prakash Loungani 分别是 IMF 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和顾问。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IMF 网站)

---

例如，更多地采取累进税并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将有助于减缓财政整顿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来减缓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智库 >

## 比特币的优势与劣势

美银美林分析师 David Woo 曾就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发布研究报告称，按照目前的供应量折算后，1 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可达 1300 美元。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美银美林另外一位分析师 Ian Gordon 对比特币的优劣势分析

文 / Ian Gordon

美银美林分析师 David Woo 曾就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发布研究报告称，按照目前的供应量折算后，1 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可达 1300 美元；比特币有潜力成为重要的电子支付手段，并可能会对传统货币转账服务提供商形成严峻挑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比特币未来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由于投机行为导致的高波动性或将成为其通向主要电子支付手段之路的绊脚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美银美林另外一位分析师 Ian Gordon 对比特币的优劣势分析。

Ian Gordon 在报告中指出，货币的三大主要职能是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鉴于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用户提高效率，且未来其应用范围会逐渐扩大，比特币拥有一定的基本价值。不过，在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方面，比特币表现出了较大的缺陷，甚至会阻碍其成为国际货币。

1 比特币的公允价值可达 1300 美元；比特币有潜力成为重要的电子支付手段，并可能会对传统货币转账服务提供商形成严峻挑战

### 比特币的优势

**第一，作为交换媒介，比特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较低的交易成本。**在比特币的机制下，交易将不再需要结算中心或金融机构充当第三方。比特币是一种基于点对点（P2P）传输技术的虚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其生成靠的是日以继夜“挖矿”的“矿工”。比特币的出现，为那些没有信用卡、借记卡或无法使用其他电子支付手段的用户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第二，在交易安全性、透明化以及防止伪造方面，比特币也有很大优势。**比特币存在于每个“矿工”的“挖矿机”中，本质上是一串加密的计算机代码，因此黑客很难盗取（尽管并非不可能）。实物比特币可能会遭窃，但大规模携带显然比纸币要困难得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鉴于比特币的电子化形式，其便携性显然优于纸币，可以有效提高大规模交易的效率。另外，比特币自诞生以来，用其进行的每笔交易都有跟踪记录，且所有比特币交易都有公开分布总账，这些都能够提高交易透明度，也有助于监管机构秘密追踪非法交易活动。

**第三，比特币具有限量供应的特点。**比特币的设计者参照了黄金的供应模式，希望以此来达到保值的目的。比特币的最高供应量定为 2100 万，为了到 2040 年达到这一供应量，今后每四年的比特币供应量增速要下降 50%。

**第四，电子货币是个“赢家通吃”的市场，随着大众对比特币的接受度及其自身普及性的提高，比特币成功超越传统货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果把电子货币看做一个大的市场，那么随着比特币日益流行，其竞争对手就会面临越来越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导致它们成功抢占比特币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目前，比特币等

其他几类与比特币有着类似特征电子货币也在悄然兴起。但鉴于电子货币是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而比特币早已抢占先机，因此其他电子货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将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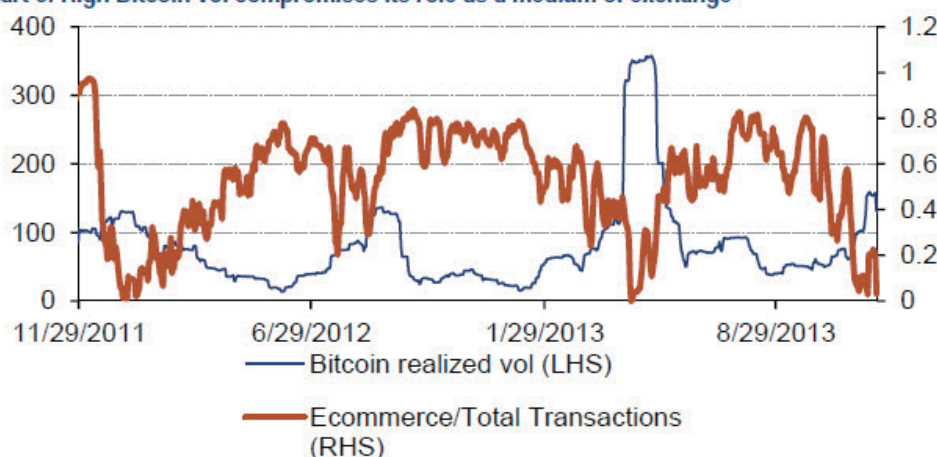
比特币的出现，为那些没有信用卡、借记卡或无法使用其他电子支付手段的用户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第五，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比特币与风险资产呈负相关关系，这点与黄金很像，投资者可以从比特币的这一走势特点中挖掘投资机会。比如，10月FOMC会议后，美联储的货币宽松立场不及预期，黄金随之下跌1%，比特币也下跌3%。

### 比特币的劣势

第一，由于价格波动性较大，比特币在价值储藏方面的功能有限。比特币价格剧烈波动反映了市场对其基本价值的估值变化较大。尤其是随着认识和使用比特币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价格波动愈加明显。11月18日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部分监管者表达了对比特币作为一种可行性支付方式的乐观看法后，比特币一度大涨50%至785美元。不过，比特币市场的投机性比较明显。在相对较低的流动性面前，投资者难以抵挡超高回报率诱惑。当然，价格的高波动性也会破坏比特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下图是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与交易量的相关性分析。目前，比特币价格波动的代价更多地是被卖方所消化，还没有过度到消费者身上。

Chart 6: High Bitcoin vol compromises its role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Source: BofA Merrill Lynch Global Research

第二，尽管比特币相较于现金在交易效率和透明度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但监管的加强会增加比特币的交易成本。首先，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愿意看到一种有助于黑市交易繁荣或逃税的新型货币出现。因此，监管者们都在想如何能够让比特币在更大程度上适应现有的支付和税收体系。但无论如何，任何新的监管措施都会增加比特币的交易成本，减少甚至消除它带给消费者的“福利”。其次，在国际范围内使用比特币交易的需求渐增，从而对国际监管和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国家加强对比特币的监管会导致比特币交易成本大增，从而限制了其作为交换媒介的效用。

第三，比特币兑换的安全性值得怀疑。由于大多数比特币使用者并不自己“挖矿”，他们只能用本国货币兑换比特币。除了汇率风险外，消费者们还应注意，比特币交易平台已多次遭黑客攻击，从而造成大批比特币失窃。据比特币交易平台 Bitcoinica 统计，其系统遭黑客攻击后丢失了 18547 枚比特币。最近，欧洲比特币交易平台 BIPS 由于系统的安全漏洞也丢失了 1295 枚比特币（约合 99 万美元）。鉴于大多数比特币使用者并不是“矿工”，因此交易平台就成为本国货币和比特币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枢纽，其安全性尚需提高。

---

11月18日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部分监管者表达了对比特币作为一种可行性支付方式的乐观看法后，比特币一度大涨50%至785美元

**第四，比特币的“铸币权”越来越集中在“矿工”手中。**由于政府没有比特币的铸造权，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转让这一权力来增加营收。这意味着，许多政府对于比特币迅猛的增长势头都会感到畏惧，甚至试图打压。

**第五，比特币的支付确认时间长达50分钟，这点会阻碍其广泛应用。**比特币支付需要较长时间确认，是希望通过复杂的程序以避免同一枚比特币被重复使用的情况发生。如果交易双方彼此非常熟悉，相信对方不会重复使用比特币，那这么长的支付确认时间似乎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但对于那些匿名交易者来说，这会产生很高的、无法对冲的风险。从这一点来看，在没有交易验证和清算中心的情况下，比特币广泛流通尚面临不小的障碍，而这也会成为其通向重要国际货币之路的绊脚石。

(作者系美银美林分析员。来源：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网址：<http://www.199it.com/archives/178051.html>)

## 中国消费增长仍然最快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弱。但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作者认为，随着改革推进，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终将上升，并最终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文 / Steven Barnett 编译 / 孔莹晖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今年很可能还是如此。然而，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中国消费疲软。中国政府和 IMF 都在呼吁消费之于经济增长的更多贡献。那么中国的消费怎么可能事实上保持强劲增长，而却被认定为疲软呢？

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使以美元计算的消费增幅更大

### 消费并不疲软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消费增幅都是最大的。而且中国消费的实际增长率也是最高的。用美元衡量的增幅由消费增速、经济体的规模和汇率三者共同决定。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使以美元计算的消费增幅更大。同样地，日元贬值也是日本消费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无论用美元还是实际增长率来衡量，中国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确实在下降。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约为 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 GDP 高速增长，且比消费增长更快。这只是计算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间，消费每年以 9% 的速度增长，略低于 10% 的平均 GDP 增速。

消费占比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储蓄率上升。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尚不完全清楚。一个较为流行的解释是预防性储蓄。家庭不能确定政府能提供多少医疗、教育和养老金，因此人们为了应付意料之外的未来开支，会进行更多的储蓄。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慢于 GDP。跟上面所述相同：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但赶不上 GDP。

### 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

简而言之，构建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提高消费占 GDP 比重。然而，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消费驱动型增长是一个外来概念。我们往往从供给角度来解读经济增长：资本（工厂）、劳动力（工人）和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产出（GDP）。而消费驱动型增长也能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

扩大服务业部门是构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关键一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规模都较小。随着服务业部门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从而消费）占 GDP 比重随之上升。此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还能降低消费者服务业的价格，从而增加销售。

其他改革措施也能起作用。目前服务业部门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金融部门的不断健全能为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健全金融部门还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因为新的理财产品可以增加投资收入。同时，社保改革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此外，目前工资税税负过重（雇员和雇主税负往往超 40%），降低税率能直接降低税收，并间接促进就业，从而提高劳动力收入。

这只是其中一些例子。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有助于提高消费占比。提高资源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土地改革都能提高居民收入，并降低居民储蓄，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服务业。

随着改革推进，最终结果将是消费占 GDP 比重上升，推动中国经济转向更平衡、

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同时，服务业部门将扩大，家庭储蓄率将下降，劳动收入占比将上升。这还意味着中国将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改善）

环境友好型（与工业相比，服务业污染少）发展道路。而且，由于消费增速将快于 GDP 的增长，中国将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原题名为“China: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Market in the World”。Steven Barnett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主管。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刊于 IMF 网站）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全球化时代，我国为何再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既为创新，“新”在何处？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载起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推动东西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

文 / 何茂春 张冀兵

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从兴起、繁盛到走向没落，跨越了 2000 多年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这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全球化时代，我国为何再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既为创新，“新”在何处？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载起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推动东西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历史传承与国际合作两个维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进行梳理，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其内涵，评估其发展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进而判断其未来的走势。

### 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历史传承与具体内涵

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近百年来，中国为重新“凿通”“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 年，古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条铁路（汴洛铁路）开始修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都规划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铁路，以便与各国的铁路网衔接。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连接陇海、兰新直达欧洲的铁路动脉全线贯通。

除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我国更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规划。21 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 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 年，我国与中亚七国计划共同投入 192 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2008 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 19 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 430 亿美元。

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

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 9000 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 1 / 4。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不悖，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

### 欧亚丝绸之路上的竞争与合作

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这些计划为我们认识新丝绸之路设想提供了参照系。

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初衷是保障能源来源的多元化。日本早期并不重视中亚外交，直到 1997 年桥本内阁首次提出“丝绸之路外交”设想，才开始加强与中亚的交往。日本政府认为：中亚各国远离国际市场，需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才能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实现一体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可以强化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日本执行丝绸之路外交的主要方式是：由日本政府提供开发援助，帮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完善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外交，日本自 2004 年起推动设立“中亚+日本”机制，通过五国外长的定期会晤来促进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为日本在这一地区赢得了好名声。但日本“丝绸之路外交”进展并不理想。首先，这可能与日本自身实力的相对衰退有关。由于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模式在中亚渐渐失去了市场。“中亚+日本”机制越来越难以与上合组织等合作框架的影响力相媲美。其次，日本对中亚地区能源的重要性及相关安全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渐渐失去了对丝绸之路外交的兴趣。再次，日本不具备开展中亚外交的地缘条件，同时本地区与日本的宗教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丝绸之路外交”进展缓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权，例如 2005 年乌兹别

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 9000 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 1 / 4

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

克斯坦爆发安集延事件后，美乌关系恶化，“中亚+日本”五国外长会议竟然因此而推迟。为了配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也染上了鲜明的政治干涉色彩，这侵蚀了与本地区各国互信的基础。

美国异常重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早在199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该法案计划通过支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来复兴连接这些国家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此，美国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2005年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强调要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以促进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2011年美国国务卿进一步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援助中亚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现“能源南下”与“商品北上”的战略目标。2012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希望将日本拉入该计划，可见其对这一计划的重视程度。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中俄两国展开地缘政治争夺的态势明显。**然而政治干涉为己方树立了对手，如伊朗；军事干涉给本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与安全包袱，如阿富汗；战略争夺迫使本地区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实际上违背了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同时，美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也并没有因介入本地区而得到根本改善。未来，较难期待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本地区大有作为。

“北南走廊”计划最早由俄罗斯、印度、伊朗三国发起，计划修建一条从南亚途经中亚、高加索、俄罗斯到达欧洲的货运通道，一旦项目完成，将大大降低从印度到欧洲的货运成本。然而自2000年提出以后，这项计划一直进展缓慢，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政治分歧久难弥合，特别是由于处在计划核心位置的伊朗态度日渐消极，项目几乎陷入瘫痪。随着印度实力的提升，2011年印度的态度转为积极，甚至表态愿意承担在伊朗境内的铁路与公路建设，这项计划方得以再度获得生机。

“北南走廊”的前景同样并不明朗。首先，“北南走廊”计划的提出仍然是地区大国在中亚抗衡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尝试，当主导大国兴趣降低后，计划往往迅速沉寂，甚至难以维系。其次，连接南北并不具备贯穿东西所能产生的巨大战略效益。再次，北南通路上障碍重重，例如，印巴之间存在巨大的战略分歧，伊朗存在较突出的不稳定性。因此，北南通路即便建成，也随时可能因突发性政治事件而再度被阻断。

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前述三个计划进行比对，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坐标体系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特性：

**首先，我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当前，东西方之间存在通联的巨大战略需求，而中国又处在绝佳的地缘位置上。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我国当是复兴丝绸之路的最佳推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包括中俄在内，大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合作的期盼远高于利益的分歧。此时推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战略构想，准确地抓住了历史机遇，既能满足我国自身发展的需求，又可为世界经济发展、文明融合作出巨大的贡献。

**其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通过坚持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中国与本地区国家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普遍的政治互信。我国提出的构想，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些举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阻力。同时，肯定、接纳其他国家在本地区内的存在，有助于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强化地

“北南走廊”计划最早由俄罗斯、印度、伊朗三国发起，计划修建一条从南亚途经中亚、高加索、俄罗斯到达欧洲的货运通道

区的一体化趋势，充分体现了大国政治的胸襟。

再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合理。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布局规划符合扩散效应原理。在构想中，软件（政策沟通）建设与硬件（道路联通）建设相辅相成，消除贸易壁垒与加强金融制度建设相得益彰，经济交往与民心交流并行不悖。这些都是我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超越既有建设计划的出彩之处。

最后，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的。新构想不仅强调政治协调、经济交流、促进安全、制度建设，更突出民心相通，人民外交的思想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这表明，中国外交正在走出权力政治的窠臼，为各国开展合作提供了典范，也是对全球经济繁荣与和平安全的重大贡献。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提出的恰当的战略建议。这一建议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其他国家的建议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然而，未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果拿捏不好，亦有可能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 缺乏主权让渡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不稳固的

首先，制度化建设的水平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值得关注。丝绸之路是一个多边外交的舞台，既涉及本地区的国家，又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甚至国际组织（如国际道路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始的政策协调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最初的制定过程是否需要排除外界因素？在缺少主导国的前提下如何排除外界因素的作用？政策协调是否需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相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国际协调而让渡自己的主权？如果有国家因特殊原因（如政变）而退出协调机制，是否需要建立补救及惩戒机制？

在制度建设上实际需要处理好两个平衡：一是主权让渡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平衡。缺乏主权让渡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不稳固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始终坚持意识形态划线，在意识形态相近的背景下，更容易形成政治互信，从而提升制度化建设的水平。然而依照我国的新丝绸之路规划，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不干涉”是使新规划能够覆盖这些差异的唯一选择，那么就要看我国的计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且需要对“不干涉”的范畴有更加明晰的界定。总体上说，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扩散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各方的利益平衡（这种平衡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另一个平衡是缺乏主导国与推进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了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中国明示放弃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上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具备承担这个地位的条件。而制度建设非有国家牵头不可，特别是在关键时期需要有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以便产生示范效应。放弃主导地位，则意味着承担额外责任的国家需要放弃额外的收益。这将考验国家对长远利益的认知以及对即期利益损失的承受能力。此外，要特别注意，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须对地区一体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的作用。

其次，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经济效益与政治协调。总体上，经济带的干线仍需以铁路交通为主，其次才是公路和石油管道，最后是其配套设施。丝绸之路途经的地带多山、多沙漠，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地理条件决定丝绸之路的很多路段只能绕行，而无法直接通过。从我国境内情况来看，现实的选择是通过新疆的霍尔果斯

正在规划论证中的中巴铁路、中尼铁路以及中吉乌铁路，均需要穿越山地，施工难度较大。但青藏铁路建成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让我们对这些线路的建设更有信心。

和阿拉山口等几个较为平坦的口岸出境。目前已经通车的亚欧大陆桥即属于此条线路。它是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唯一的出境铁路，目前看来，这条线路应该无法承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部需求。正在规划论证中的中巴铁路、中尼铁路以及中吉乌铁路，均需要穿越山地，施工难度较大。但青藏铁路建成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让我们对这些线路的建设更有信心。目前，中尼铁路已经开始施工，我国将把青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边境。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因其重大的战略及经济效益，目前已经得到各方的鼎力支持，顺利完工也是可以预期的。未来在西南方向经广西、云南出境前往东南亚和南亚的线路也应该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

要想使交通线充分发挥扩散效应，选址除了考虑地理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例如同样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线，穿越人口稠密地区的线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西伯利亚铁路。除了人口与物产分布外，避免重复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应该统筹考虑与本地既有基础设施的衔接问题。例如，新丝绸之路不妨考虑与“北南走廊”计划等联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已建成设施的效用，缩减早期投入。

与技术和规划因素相比，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政治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例如，俄罗斯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大国，也是利益攸关的国家，俄方的态度能够对新丝绸之路设想产生重大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俄视中亚地区如自家后院，不太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在这里扩张影响力。从功能上看，新丝绸之路规划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有明显的重叠，需要进一步协调两者的角色定位。再例如，中尼铁路需要充分考虑印度因素；西南方向出境的路线需要协调东南亚各方的立场，此外还要充分考虑美、日、欧盟等在本地地区有影响力的其他大国的因素。总之，新丝绸之路将是一个多边角力的舞台，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人员、谈判人员尤其是政治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

最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成，还取决于能否成功消解一些人人为的障碍。新丝绸之路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与腐败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这是与海运相比的一个突出劣势。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都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调查，往来于阿富汗的卡车司机中，90%的人认为官僚是开展跨境贸易的最主要障碍。至少在短期内，设立跨国边境管理机构是不现实的选项。如何把这些人为的消极成本降到最低，是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除了边境管理，安全保障是另一个突出的人为障碍。“三股势力”长期在中亚地区肆虐。费尔干纳谷地目前是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营地。境内反动势力与境外恐怖分子勾结，进行破坏油气管线等恐怖活动的威胁并非杞人忧天。区内部分国家，如阿富汗、缅甸等局势仍然动荡。毒品等跨境犯罪问题尚未得到根治，湄公河惨案的警钟尚在耳边回荡，阿富汗山区又崛起成为新的海洛因主产区。印巴之间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中亚国家之间也屡有龃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诱发政治对立甚至军事冲突。这些地区内部问题再加上地区外的政治势力的挑唆、干扰、破坏，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得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努力付诸东流。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前景展望

尽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实施存在严重的潜在挑战，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

对新丝绸之路的前景表示乐观。

第一，“新丝绸之路”可以分期分阶段实现既定目标。这一构想的空间上大致分五个区段：东亚段、中亚段、西亚段、中东欧段、西欧段。时间上可以按近期、中期、远期来分阶段建设。重新激活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对于沿途国家的经济建设、地区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极大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对外开放前沿与经济成长段，西部地区的面貌及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台阶。通过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所谓“塌陷地区”的国家将有机会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逐步消除贫困与落后，这又有助于根除极端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的温床。新丝绸之路将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仅有利于促进贸易、繁荣经济，更有利于东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源自不同民族、文化、种族的群体的相互包容。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一计划将得到地区内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与预期收益相比，更引人入胜的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历史价值。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丝绸之路构想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它主张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方的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阻力，扩大支持的基础，并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这些优势是以势力范畴争夺或贸易保护为目的的排他性地区经济合作所无法比拟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同步推进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民心方面的沟通与建设，突破了由单一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的传统模式，使得这几方面得以相辅相成，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

第二，中国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主导和中枢作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无论是技术准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乃至政治与安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我国提出这一构想，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大国外交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源于对自身实力与战略目标的认知，也源于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勇气与能力。中国目前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这一计划的实行，而且可以从中获得直接和间接的回报。中国推行这一计划，政府发动、企业主导、市场推动、国际合作，可行性越来越明显。

第三，自从中国提出这一计划以来，得到了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各国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带来的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全面复兴。这是“中国梦”，更是“世界梦”、“人类梦”。

（何茂春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张冀兵系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国经济外交年鉴》执行主编。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2月上）

## 什么是数据主权？

如果说“互联网主权”、“信息主权”仍然带有传统国家安全的政治意味，“数据主权”则伴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挖掘而进入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视野

文 / 胡凌

本文用“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描述互联网信息巨头们对海量数据的占有和使用，以区别于依托传统主权理论而衍生出的“互联网主权”、“信息主权”（information sovereignty）等概念。如果说后者仍然带有传统国家安全的政治意味，数据主权则伴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挖掘而进入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它涉及数据的收集、聚合、存储、分析、使用等一系列流程，背后反映了新经济的价值链，反映了数据的商业价值。本文将按照一系列传统范畴辨明数据主权的实质，以及和信息主权之间的显著差别。文中“数据主权者”“互联网企业”等概念将不加区分。

### 契约

现代国家主权的理论来源之一是社会契约，人民因种种原因订立契约，推出主权者，从而结束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主权者执掌对内的最高统治权，确立合法性。数据主权者同样依赖于契约，只不过从政治契约变成了商业契约。**按照通行的契约条款，数据主权者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换取对用户发表内容和个人数据的永久使用权，并通过不断改善服务（基于对用户偏好的分析预测）获得合法性。**这使得数据主权者拥有永远可以使用的互联网信息，而不必担心用户删除账号退出互联网。

商业契约的订立目标是通过免费信息吸引用户，换取其注意力，获得广告与增值收入，从信息中产生经济价值。它极大偏向于数据主权者，充满了免责条款，并尽力将自己描述成服务合同而非货物买卖合同，从而避免了产品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网络产品的服务化正是互联网企业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实现的目标，例如 SaaS、PaaS 等。

### 身份与认证

用户和互联网企业之间通过商业契约联系在一起，表明自己消费者的身份。事实上用户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且是主动的信息和数据生产者。每天有大量信息被用户利用自己的剩余时间生产出来，同时吸引了更多的用户，通过网络效应增加网站的价值。**用户和数据主权者的关系就超越了简单的消费者—商家的关系，同时表现为劳动力—工厂的关系。**用户可以同他人分享生产的内容，也享受着精准营销带来的益处。和单个用户的个人数据相比，海量用户聚合的信息能够产生更大的集体性价值。

数据主权者不仅仅关心作为消费者的用户身份，还试图将触手伸向其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获取相关信息，力图掌握同一人不同的社会身份。数据主权者未必掌握用户的姓名等基础信息，却可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真实数据用于精准营销，满足用户管理虚拟身份的需求，身份认证更加彻底。这与政治主权者形成了对照，后者主要关注公民涉及及公共生活的行为认证，搜集数据，建成公共数据库（犯罪、税收、医疗、社保），为良好治理奠定基础。

### 公共领域

表面上看，数据主权者将信息内容向全体用户开放，允许用户生产和共享使用，形成了前所未有繁荣的公共数据池。甚至私人数字图书馆已经在服务便利上赶超公共图书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就此形成。首先，随着互联网企业

数据主权者未必掌握用户的姓名等基础信息，却可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真实数据用于精准营销，满足用户管理虚拟身份的需求，身份认证更加彻底。这与政治主权者形成了对照

聚集的信息内容增加，只有隶属于本主权者的注册用户才有权使用，更不用说相互竞争的其他互联网企业。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正当竞争即发端于未经授权大量复制其他同类网站的内容。其次，免费使用只是当前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副产品，用于积累用户流量，击败竞争对手，并非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第三，**这一貌似繁荣的公共领域逐渐被不同的信息帝国瓜分，后者拥有排他使用权，往往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而不取决于用户的态度。**

### 领土、边疆与安全

数据主权者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信息世界的入口，就相当于掌控了信息世界的“总开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浏览器、平台都可以成为这一入口，以便争夺作为生产资料的信息内容和用户流量。对数据主权者而言，并不存在需要通过军事力量守卫的广袤领土，相反，它要求超越国界边疆，争取数据在主权国家之间畅通无阻。取代领土的将是承载海量数据的服务器。它们可能沉于深海，可能置于太空，可能固定在北极圈，也可能漂浮在大洋上。当数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的时候，云端服务器会在世界各地分布，对主权国家而言就出现了数据跨界监管的难题。目前中国的情形是数据服务器落地（例如微软 Windows Azure 云计算平台），严格限制数据跨国流动，无法适应高速信息流动的云数据状况。

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汇集聚合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分布式终端设备时代（例如台式机），数据的储存和计算都在本地进行。新兴的云计算进一步将用户数据从他们自己的控制中脱离并占有（从终端储存到不知所在的云储存），同时结合其他免费服务共同追踪用户偏好。用户的一切内容逐渐都可以在云端实现即时访问，也就更加难以脱离特定的信息帝国。

互联网的开放匿名特征使安全问题（木马、病毒、黑客）变得尤为突出。为了让用户享用更好的服务，防止流失，数据主权者不得不加大安全投入，防护自己的网站和服务，同时也占据了广大用户的桌面。当用户桌面和终端还是开放平台的时候，不同的数据主权者难免发生冲突。但随着纵向一体化模式的成熟，巨头们纷纷打造自己的平台，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上下游供应链，使互联网变得愈加封闭。换句话说，数据主权者要求超越传统国界，同时也在打造新边疆。

### 架构与法律

**目前中国的情形是数据服务器落地（例如微软 Windows Azure 云计算平台），严格限制数据跨国流动，无法适应高速信息流动的云数据状况**

Lawrence Lessig 的《代码》一书中强调网络空间中的主权利来自于架构设计，商业契约的订立为架构设计的约束力铺平了道路。上述谈提及的身份认证、塑造内容信息池、创设平台和入口、改变信息的法律属性等都是通过架构设计实现的。在自己的信息帝国领域内，数据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架构设计权，和法律、社会规范与市场一样，直接在微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用户的行为。这比物理空间中的主权者法律更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意志。

从外部来看，在同传统经济利益争夺用户的过程中，数据主权者也同样改变了工业生产时代的法律，财产、隐私、言论、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垄断、广告等领域的规则纷纷受到挑战。这一挑战的过程也是数据主权者在生产方式意义上“非法”兴起的过程，互联网企业要求新法律保护其利益，直到它们确立合法性，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为止。

### 意识形态

和传统主权国家一样，数据主权者也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维护其利益。诸如合作、信息自由流通、言论表达自由、分享、公共领域等话语纷纷成为捍卫数据主权的无法动摇的基石。这些话语承接传统价值，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些话语同时意味着鼓励用户生产大量信息内容，帮助推动消除阻碍信息流通的各种

障碍，从中获得收益。像尊重隐私这样的传统价值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行为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了人类合作的本能与受限理性，从而使坚守隐私权和个人自主变得不合时宜。

综上所述，数据主权和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简化为信息的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当我们讨论互联网主权新问题的時候，可能同时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关注这另一种“主权”，以及这究竟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

（作者系巨杉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来源：《经略》第33期，2013年11月）